

文化：社会学的视野

[美]

约翰·R. 霍尔
玛丽·乔·尼兹

著

文化和传播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Cultur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ultur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ultur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商务印书馆

文 化 和 传 播 译 丛

文化：社会学的视野

〔美〕约翰·R. 霍尔 玛丽·乔·尼兹 著

周晓虹 徐彬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美)霍尔,(美)尼兹著;周晓虹,徐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文化和传播译丛)
ISBN 7-100-03363-2

I. 文… II. ①霍…②尼…③周…④徐… III.
文化社会学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96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和传播译丛

文化:社会学的视野

[美] 约翰·R. 霍尔 玛丽·乔·尼兹 著
周晓虹 徐彬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63-2/G·446

200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2

定价: 25.00 元

John R. Hall and Mary Jo Neitz.

CULTUR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PRENTICE-HALL, Inc. 1993

根据普伦蒂斯 - 霍尔出版公司 1993 年版译出

文化和传播译丛

总 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

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言.....	8
致谢.....	10

第一部分 迈向一种文化的社会学

第一章 社会学与文化.....	14
-----------------	----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定义文化(18)

思考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性框架(38)

第二章 作为道德话语的文化.....	42
--------------------	----

个人和治疗性的文化(44)

道德文化和叙述(65)

结论(76)

第二部分 当代文化形成的来源

第三章 解构乡民文化.....	80
-----------------	----

作为现代之镜的过去的概念化(83)

仪式和社区团结(88)

联系与构成(101)

弦外之音(102)

结论(107)

第四章 当代文化的前工业源泉110

程式化、理性化与突生的资本主义经济(112)

城市经济和突生的文化形式(124)

结论(140)

第五章 工业主义与大众文化143

大众生产的含义(147)

批判理论(149)

大众分配(155)

大众消费(167)

结论(173)

第三部分 分层、权力与文化生产

第六章 大众生产时代的社会分层与文化178

群体理论(180)

市场/阶层群体理论(186)

市场/地位群体理论(196)

社会进程中的文化和分层(206)

结论(214)

第七章 权力与文化216

权力与既定文化秩序(219)

文化生产的所有权(234)

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241)

结论(250)

第八章 文化的生产252

艺术世界(254)

文化产业(269)

报酬(276)

国家与文化生产(280)

新闻的生产(287)

结论(291)

第四部分 文本、行动和社会秩序

第九章 文化客体、阅听人和意义294

意义内容的问题(299)

用途、效果和议程:文化客体和阅听人的相互作用(312)

阅听人理论(321)

结论(330)

第十章 文化、行动与变迁332

物质文化(335)

文化与行动(342)

文化与变迁(360)

结论(365)

第十一章 后现代主义的未来367

没有定义的后现代转向(371)

作为一种文本转向的后现代转向? (376)

旧制度的存留:现代性与工业主义(387)

从后现代主义出发?(392)

附 录

附录一 研究方法资料综述401

解释的转向(401)

人种志和口述史(402)

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404)

内容分析(406)

谈话分析(408)

人口统计分析(409)

附录二 文献综述411

第一章 社会学与文化(412)

第二章 作为道德话语的文化(417)

第三章 解构乡民文化(423)

第四章 当代文化的前工业源泉(428)

第五章 工业主义与大众文化(433)

第六章 大众生产时代的社会分层与文化(437)

第七章 权力与文化(443)

第八章 文化的生产(449)

第九章 文化客体、阅听人和意义(456)

第十章 文化、行动与变迁(462)

第十一章 后现代主义的未来(468)

参考文献	476
人名索引	500
主题索引	510

中 译 本 序



一位作者总是乐于见到他的作品被译成其他语言并在另一个国度出版,我们也不例外。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一书的中文版,同时也感谢促成此书问世的三位朋友:商务印书馆的侯玲女士;文化和传播译丛的主编周宪教授;以及本书的译者周晓虹教授,他对本书进行了精当的翻译,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将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关于文化的著作译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是非常及时的。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中对社会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和历史学分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十年前流行的解释途径是建立在相互对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其中一方主张结构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取向,而另一方则主张文化的取向。实际上,晚近许多研究也延续了这一对立,强调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观点。例如,世界体系理论仍强调经济因素,而所谓的文本的转向使得有的作者认为那些似乎是物质的过程——甚至是经济市场的运作——其制度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但一个更戏剧性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人将物质和文化视为相互交织的两种过程——如果这些过程不是在根源上就已相互联系的话。由于这种发展,对于文化的理解比半个世纪前更为紧迫,即使对那些对社会世界的物质和结构层面感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西方具有更深厚的历史深度。中文中的“文化”一词既意指“文化”，也意指“文明”。这一双重意义表明了“文化”和“文明”在语义上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人们只需想到从易经和道家的古代思想到晚近的文化革命，中国人对行动之礼仪的强烈关注，就能够理解文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但是，文化与文明的联系并不只是中国所独有的。许多类似的联系也能在西方找到。最近十年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获得了重新思考。了解西方对于文化的这种理解特别重要，尤其是在讨论文化的著述被越来越多地译成中文之时。在中国，在西方也是一样，“文化”(Culture)(这里所称的文化在英语中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用来指一个社会最好的、最重要的思想与作品(所谓的“高雅”文化)，这就使这一术语等同于“文明”。即使当文化一词并不意指“高雅”文化时，在像 20 世纪美国社会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这样的学者的著作里，文化也表示一种主导性的规范与价值的社会模式，由此共享的道德标准组织了整个社会。这些意义中的每一个都与中文的文化的双重意义相呼应。

不过，在以往的半个世纪里，对于“文化”一词的一种迥然不同的理解出现在西方。“文化”一词不再必然地仅与一种主流的或核心的文明概念或价值和规范相一致。相反，一种更为迥异的文化观点也已出现，这种观点指向了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文本性(霍尔，1995 年；萨默斯，1997 年；亚历山大和史密斯，1998 年)。语言毕竟是文化的一种，也为思考文化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模式。多种语言同时并存，如“高雅的”语言、“方言”，

或者说是任何特定的语言的地方表达形式;并且,有的语言是通过两种原有的语言的结合而形成的(例如斯瓦希里语[Swahili]),或者是从另一种语言进化而来的。这些语言的可能性也普遍地表现在文化模式里。

一条基于文本性模式的社会学原理认为,多种文化结构可以并存,并且是被社会行动者不均匀地进行社会性分配和重组的。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主题,但不可能在前言中对此进行完整的讨论。在这里,重要的是中文读者对西方理解中的此种转向的认识,应该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种前奏。作为作者,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确实认为这值得考虑。20世纪的发展使得文化不仅对于西方来说很重要,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全球化也与文化有部分关联(哈威,1989年)。基于大众化生产、大众化消费、大众传播和旅行的全球贸易,如果不从其文化方面去考虑,也不能被充分的理解。反之,这些社会变迁提出了许多文化政治问题,以及民族和地方文化的自主性问题。因为这些变迁,没人能声称自己能预先解决知识性问题。相反,其任务在于发展一种更复杂的理解文化的方法。

本书自1993年英文本出版以来,西方世界许多关于文化的讨论开始集中于本书涉及的那些问题,同时这些讨论也为这些论题提供了及时的综合。即使如此,自本书写作以来,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进展。其中有三个相关的论题需要我们着重探讨。

1. 后现代性与社会历史研究。在本书第十一章涉及的关于后现代文化的争论依然非常重要,对于是否能够接受后现代理论家们提出的所谓“文本的”或“语言学的转向”,研究者们众说

纷纭。许多作者开始沿袭我们的基本分析思路：一方面，他们同意最为重要的是理解后现代文化的发展，例如文化的杂交和以文化为核心的动力机制内的其他现象的包抄（enveloping）；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后现代社会的兴起并不会终结在后现代性出现之前业已存在的持久的社会过程（例如，分层和组织的过程）。即使持续的和突生的社会过程是并存的，紧要的任务也是发展更为有效的方法论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谈到研究方法论，我们中的一位作者（霍尔，1999年）已经表明，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科学的和理解的方法在预设前提上的区别，并非像原先认为的那样是本质性的。所有的社会历史研究，就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已内含了价值话语、叙事、社会理论、解释和理解。确定这些话语是所有研究都共享的，可以使更为清晰的研究方法的专门化成为一种“文化逻辑学”，同时也使得不同知识之间的转译比以前想像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理解了知识的生产涉及文化实践这一点，就为我们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有关文化和社会过程的关系的研究焦点上，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假想差异提供了途径。

2. 文化结构、话语与变迁。如同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十章中讨论的那样，文化模式深刻地蕴含在一个社会的核心道德观念、个体赋予行动的意义和个体认同的亚文化中，所有这些都归结为意义的冲突。如同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经典研究表明的那样，新的亚文化（和反文化）意义的出现有时是因为特定社会阶层的文化需要，有时它们对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社会模式也不无裨益。晚近的著作促进了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亚历山大和史密斯（1993年）认为，某个既定的社会（他们的个案是

美国)拥有一种群体共享的文化代码,这些代码将道德上正当和道德上不正当的事件、个人、组织和社会制度作了有效的区分。这种两极对立的文化代码为有意义的公共话语的展开提供了框架。但这种代码并非不可改变,其应用也不是没有经历社会争论的。于是霍尔(1995年)、凯恩(1997年)、巴塔尼、霍尔和帕沃斯(1997年)、波洛塔(1997年,1998年)以及普拉卡什(即将出版的著作),都强调意义建构的偶然的叙述过程是怎样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运作的,他们还揭示了意义的多样化和突生性特征。这些晚近的著作为一种崭新的话语分析开启了大门,这种话语分析考察了文化结构在社会群体和社会的长时期历史中是如何被建构和重构的。尽管话语的文化过程典型地出现于面对面的或直接的互动中,但它们有潜力去创造和重新组织文化结构,以影响整个社会甚或全球化的转型。

3. 历史与记忆。在过去的十年里,如同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研究者越来越对意义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尤其是以个体和群体记忆为中介的这种关系(可参见康纳特,1989年;芬特雷斯和威克姆,1992年)。令人兴趣盎然的记忆研究,关注的课题是群体性的社会精神创伤,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杀戮(Holocaust)(兰格,1991年;扬,1993年;哈特曼,1994年;拉帕波特,1997年)。但是,社会记忆过程的对象并不限于大规模的和精神创伤性的事件。约翰·沃尔顿(1997年)的研究表明,加利福尼亚州捕鱼工人居住的小镇蒙特瑞被重塑为一个旅游胜地,部分是通过有关历史建构的社会斗争实现的,这种建构以建立一种群体认同的新叙述的方式删除了对某些事件的记忆。叙述,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总是处在记忆